

英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和非殖民化：我们还在止步不前吗？

奥莫拉贝克·法昆利、契索莫·卡林加、薇姬·刘易斯

奥莫拉贝克·法昆利 (Omolabake Fakunle)：英国爱丁堡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教育、社区和社会研究所 (the Institute for Education, Community and Society) 特别研究员

电子邮件：Omolabake.Fakunle@ed.ac.uk

契索莫·卡林加 (Chisomo Kalinga)：英国爱丁堡大学社会和政治科学学院 (the School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特别研究员

电子邮件：Chisomo.Kalinga@ed.ac.uk

薇姬·刘易斯 (Vicky Lewis)：英国薇姬·刘易斯咨询公司创始人

电子邮件：vickylewisconsulting@gmail.com

有关国际化的论述主要是以学生的流动性为中心，并且主要以经济为导向。因此，学者的讨论大多是围绕着市场化以及对国际高等教育新自由主义转向的批评。在国家层面上，西方国家的国际教育组织仍主要关注“西方化的、主要是盎格鲁—撒克逊式的、以英语占主导的范式”（见德威特[Hans de Wit]和琼斯[Jones]在《国际高等教育》第 15 卷第 2 期撰写的“错失的机会和有限的国际化愿景” [A Missed Opportunity and Limited Vision for Internationalization]一文）。在大学层面，最近在美国的研究表明，国际化政策可能与学生、教师和行政人员的种族化生活经验 (racialized lived experiences) 脱节。我们的文章与国际化研究的最新学术成果相呼应，研究了与国际化有关的种族化和非殖民化。

当前世界秩序的问题化

对当前世界秩序（包括学术界）留下的未解决和持续存在的殖民化问题，已经由“珍视黑人生命”运动 (Black Lives Matter) 和“罗

德必须倒下” (Rhodes Must Fall) 的抗议活动传遍全球。这重新激发了人们对大学非殖民化的呼吁，要求大学承认西方认识论的霸权定位，以及由此产生的知识体系的流失和边缘化。在这个意义上，有人认为非殖民化是“一个关于我们是谁的学习过程，是一个持续形成、归零、再学习的过程”。我们认为，这个持续的学习过程构成了辩证的学术交流基础，在试图“使大学非殖民化”的过程中认识到历史和当前的权力动态。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考察了英国大学在战略和政策、教学实践和研究合作中围绕国际化和非殖民化的解释和争论。我们就这两个过程中会发生的事情以及其中的复杂性提出了建议。

重新规划我们的机构战略

以英国为例，我们可以追溯大学的国际战略是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变的。近来，大学的国际战略通常被描述为“全球参与战略” (global engagement strategies)。从表面上看，这些战略是外向型的，旨在大学间建

立长期关系以及大学为全球做出积极贡献。但它们到底有多大区别？这些“参与”战略究竟是在与谁接触？所设想的关系是否仍将英国机构置于主导地位？

一项名为“英国大学全球参与战略”的报告，探索了全球参与在英国大学战略中当前和未来作用。该研究主要结果表明，虽然战略用语愈发以价值观为主导，但选择用来评估成功的措施却没有什麼变化，大多数都与院校形象、影响力或收入有关。西方的、以盎格鲁为中心的国际化概念很少受到挑战，非殖民化也几乎没有被提及。

发展国际课堂

最近，英国高等教育界对非殖民化重新产生了兴趣，试图了解非殖民化的研究和课程到底是什么样子。学术界和学生都通过“为什么我的课程是白色的”这样的战术干预对不愿“学术非殖民化”提出质疑，并批评为什么课程（和教授课程的工作人员）缺乏非白人学者的代表。

此外，经合组织（OECD）的数据显示，在 610 万国际流动学生中，超过 40% 的学生都集中在四个英语母语国家学习：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这对教学实践和以第二语言学习的学生来说都有影响。

在国际化的课堂上，不同文化和语言的融合可以为不同角度的批判性或可能令人不舒服的对话讨论提供一个空间。这表明，国际化有可能为高等教育的非殖民化提供一个空间。但这将需要人们达成一项共识，即：多样性为每个人创造了学习和教学的机会。然而，在国际话语中，对国际学生学术缺失的看法一直存在。这种赤字叙述被描述为新帝国主义。换句话说，西方的认识框架仍然是国际化的主导概念。因此，这产生了一个问题：

国际化能在我们的教学实践中被非殖民化吗？

重新调整研究合作的概念

2020 年高等教育政策研究所（Higher Education Policy Institute）所发表的一篇文章提出了几项建议，以确保英国高等教育的非殖民化侧重于增加对黑人、亚裔和少数族裔（Black, Asian, and minority ethnic, 英文简称 BAME）学者的资助。这些建议包括增加研究支持和奖学金，解决课程设置中的缺陷，设立部门角色来解决非殖民化问题，并努力纠正对术语和过程的误解。主要的研究资助者，如英国研究与创新协会（UK Research and Innovation）和威康信托（Wellcome Trust）也试图解决与科学研究中非殖民性有关的问题。例如，惠康信托基金出版了一份资料，为其组织和研究中的反种族主义做法提供参考。

反驳者指出，这些反思的范围仍然是以欧洲为中心的，更注重英国资助者和大学方面的“自我完善”。相比之下，非洲大学领导的一些做法通过改善课程、研究目标和国际合作的整体措施来解决非殖民化问题。此外，最近的一份共识声明为研究人员制定了指导方针，以促进中低收入与高收入国家研究伙伴关系中公平的作者资格。由于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大学依赖西方的资金来支持他们的研究项目，特别是在健康和发展领域，因此需要做更多的工作，从而可以以发展中国家机构的需求为中心，剥离高等教育中持续的殖民主义遗产，促进有意义的合作。

将非殖民化植入国际化中

目前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大学的国际化议程明确地指向非殖民化。这回答了我们标题

中提出的问题。它也引发了另一个问题：我们该何去何从？

尽管一些大学将重视其他文化和观点作为国际化的核心，但在开启关于国际化非殖民化的辩论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这个复杂的过程中，大学处于不同的阶段。许多大学甚至还没有开始。

要推进非殖民化的国际化议程，需要各机构真正接纳知识的多样性，并通过扩大的视角来面对制约认识、持续存在的霸权主义结构。因此，不同全球背景下的所有利益相关者都需要挑战“全球参与”的措辞，因为它似乎提出了一个非政治化和非种族化的前景。曾经被边缘化的利益相关者也重申，有

必要纠正全球高等教育机构结构中长期存在的殖民化遗留问题。国际化的非殖民化战略必须得到切实的政策变化的支持，以反映学生和员工的生活经验。国际化目前主要表现为提供跨文化的联系，这为重新认识国际化提供了一个潜在的途径，首先是将国际课堂作为一个多元化视角的场所，可以推动课程和教学法的非殖民化。其次，我们需要重新认识研究合作，以便通过在这个过程中把次时代的声音放在中心位置，使被边缘化的伙伴得到优先考虑。总而言之，国际化政策必须明确地拆除殖民主义的遗产，将目前国际化的表现作为这一复杂但必要的过程的起点。